



林乾 著

与

康熙惩抑朋党

林乾著

康熙惩抑朋党
与
清代极权政治



019125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林乾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309-09314-8

I. 康… II. 林… III. 政治体制-研究-中国-清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6912 号

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

林 乾 著

责任编辑/关春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94 千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314-8/D · 594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序论	1
二、明珠、索额图之争	5
(一) 勋戚重臣索额图	5
(二) 权力平衡术与明珠入阁	11
(三) 平叛期间明珠、索额图力量之消长	14
(四) 明珠集团的崛起	19
(五) 围绕辅导皇太子的斗争	31
(六) 河务案与明珠罢相	46
三、统治基础的巩固与汉官集团的倾轧	57
(一) 满族权贵的附庸	57
(二) 汉官集团的发展及与满贵之分途	66
(三) 汉官集团的内部倾轧	72
(四) “南北党”之争与满汉之牵连报复	89
四、皇、储之争及对皇权的挑战	106
(一) 皇子参政及其权力之扩张	106
(二) 太子代理国事及权力核心的形成	113
(三) 处死索额图与皇、储矛盾之升级	123
(四) 溜淮套工程的出笼与第六次南巡	137
(五) 议立太子风波与皇八子党	156

(六) 权力一统与严惩皇子党	175
五、党争的时代特征与极权政治	184
(一) 内阁权力的消长与传统政治的终结	184
(二) 风闻言事之禁与监察职能的弱化	194
(三) 八旗传统对皇权的挑战	206
(四) 朋党的时代特征与民族特征	216
(五) 惩抑朋党与极权政治	229
六、结语	241
主要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49

一、序 论

朋党作为中国专制政体的衍生物，植根于传统社会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之中。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互为冲突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政见的歧异、地域的偏见、血缘的区别、门第观念的不同等，无疑成为朋党集团形成及其斗争的诱因。

在中国封建王朝演进的漫长历史中，朋党如影随形，经久不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朋党之兴衰不仅是皇权强弱的晴雨表，而且往往还透视出一个王朝的生死荣枯。因为，朋党虽然是君主制的产物，但它又极易演化为专制皇权的对立物，构成对后者的巨大威胁，“国无党祸而不亡”、“朋党交持，祸延宗社”^①的惨痛教训，使帝王们视朋党为寇仇，“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②，“朋党小人，自古帝王之所必诛”^③。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也同样遇到了朋党这一棘手的难题。乾隆晚年曾得意地列举了“前代所以亡国”的八大政治因素，即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祸、宦寺、奸臣、佞幸，认为“今皆无一仿佛者”^④，以证明其统治的巩固和成功，但是这八种因素中却没有朋党，这是弘历的大意疏漏还是有意回避？抑或一脉相承的康雍乾三帝都没能解决好这一问题而有意淡化之？

清代前期的几位统治者，鉴于晚明朋党之争祸延宗社的历史教训，对朋党势力都采取了严厉惩治抑制措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一、二五。

② 《全唐文》卷六四五，李绛：《对宪宗论朋党》。

③ 《清史纪事本末》卷二五，《严禁朋党》。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己未。

斗争,但由于朋党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朋党集团构成又几经变化,因此不能一概而论。顺治朝竞争主要是明末党争在新王朝中的延续和移植,更多地打上汉族官僚集团内部斗争的烙印,从多尔衮到福临,他们都运用“以汉治汉”这一策略来平衡所谓“南北党”之争,服从并服务于军事征服和确立全国统治这一总目标。

康熙时期则不然。一方面,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的历史已尘埃落定,一个空前而广袤的大帝国尽裸在一个新王朝的面前,“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守之”,攻守异势的客观形势已使清朝统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与汉文化及其载体——官僚士大夫短兵相接了。如何对待汉法、汉制?怎样构筑满汉联合统治?这是康熙时期必须致力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满族政治传统中因八旗诸王贵族势力之坐大所导致的皇权不振,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统治形势,其矛盾、弊端迫使统治者改弦更张,抛弃固有的妨碍皇权强化的政治传统,抑制、打击不利于皇权统治的政治势力。换言之,康熙面临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满族内部和汉族传统。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康熙虽然承继了明朝的统治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尝试建立一套区别于以往朝代的统治形式——极权政治。康熙时期的朋党集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并相继成为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的政治力量的。从康熙前期索额图、明珠等满族勋贵党的落马到中期徐乾学、高士奇等汉人党的崛起以及二者之间既勾结利用又矛盾斗争的历史表象,乃至最后康熙晚期皇、储矛盾的加剧和诸皇子党的粉墨登场,看似无紧密联系的事象实则有其深刻而内在的关联性。研究康熙时期的朋党无疑是解读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诸多政治矛盾的一个独特视角。

康熙亲政后对鳌拜集团的清除反映了前者试图摆脱贫族政治传统对君权掣肘的强烈要求,而康熙手中的盾牌并不新鲜,他承继了明朝的体制,以内阁大学士执掌要务,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已改组为议政大臣会议,其权力已今非昔比,成为康熙驾驭下的议政机构。索额图崛起于除鳌拜,明珠崛起于平三藩,二者皆以功显,而

其能够纵横捭阖的载体即是内阁。康熙倚重阁臣使政治天平向内阁一方倾斜，阁权的加重为索额图、明珠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创造了条件。基于从传统君相制的角度出发，本书把明珠视为明代内阁制建立以来的一个权臣，是因为他的结党自固更多通过内阁而实现。

当索额图、明珠势力膨胀时，康熙意识到对阁臣的过多倚重会形成一种游离于皇权之外的势力。在平抑这种力量时，适应对汉族传统典制的吸纳及扩大统治基础需要而完全听命于皇帝个人的御用机构——南书房诞生了。这一机构无疑起到了以汉抑满的作用，而徐乾学、高士奇等人从依附满族勋贵到独掌门户并进而结党营私与后者相颉颃，很显然是南书房权力得到充足发展的一种反映。清人称“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①。与内阁权力具有向外伸张性不同，南书房的权力虽然也有曲缩张驰，但更多的是内敛性，即它由皇帝所操纵，不具有与皇权相抗衡的发展趋向，其权力的发展是皇权强化的折射反映。康熙中期出现了徐乾学、高士奇等“汉党”，一段时期确也权炙可热，但旋踵即败亡而归。从平定三藩时“招之唯恐不来”，到康熙中期“挥之唯恐不去”^②，康熙对汉族官僚士大夫的政策变化透视出满汉统治基础趋于巩固以及满汉权力平衡体系的构建已经完成这一历史事实。在此期间康熙有意利用甚至唆使汉官内部的倾轧以及满汉之间的争斗，朋党之争事实上成为皇权扩张的工具。

在巩固皇权的过程中，康熙另一项重要的“发明”是将家族力量引入国家权力中，严格说来，这是向满族祖制的回归。本来，在八旗内部存在比较严格的隶属关系，旗人出掌国事却对本旗主有效忠义务已经严重影响了旗、政分工，以及将国家权力纳入定制化

^①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41页。

^②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382—383页。

轨道,康熙中叶以后,玄烨赋予皇家兄弟子侄以军、政、旗等项要务,使诸皇子的力量得到加强,尤其是皇太子党的形成已明显成为第二权力中心,构成对皇权的分割、弱化乃至威胁。康熙后期围绕废、立储之争而展开的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诸皇子党争是玄烨亲政以来最大的一次统治危机。这次由皇位继承权引发的斗争逐渐演化为直接威胁统治权的斗争,它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员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因如此,康熙在维护权力一统的过程中,采取了比前期、中期更为严厉的惩治手段。

本书按照康熙时期朋党集团发展及其衰败的时间顺序,将历史事件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重视角,透视几乎贯穿康熙一朝的朋党现象,以期揭示其本质。

本书“康熙朝朋党研究”部分,将康熙朝朋党分为三个阶段:“康熙初年朋党”、“康熙中后期朋党”和“康熙晚期朋党”。康熙初年朋党,主要指康熙朝初期,康熙帝对皇太子党、八旗三姓集团、江南三吴集团、江浙财团等朋党集团的惩治。康熙中后期朋党,主要指康熙朝中期,康熙帝对皇太子党、江南三吴集团、江浙财团等朋党集团的惩治。康熙晚期朋党,主要指康熙朝晚期,康熙帝对皇太子党、江南三吴集团、江浙财团等朋党集团的惩治。

的权力斗争，为以后的“夺嫡”埋下伏笔。康熙即位后，对索额图等人的打击和压制，使他深感惊惧，但又不甘心就此认输。

二、明珠、索额图之争

明珠本是满洲正白旗人，但其父明珠之子，即顺治朝的明珠，是汉人，所以他的族名也叫明珠。他生性好财，善于经营，是顺治朝的四大臣之一，地位仅次于索额图。他与索额图同属满洲正白旗，但两人在朝中的地位却截然不同，明珠位居要职，而索额图则位居次席。两人在朝中的地位悬殊，使得明珠对索额图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和嫉妒之心。

(一) 励戚重臣索额图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福临病逝，遗诏以大行皇帝之子、年仅八岁的玄烨嗣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索尼等以“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其本人等“皆异姓臣子”，请求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贝勒以“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相答。索尼等奏知皇太后，誓告于皇天上帝、世祖皇帝灵位前，誓词中有“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等内容^①。初九日，玄烨即帝位，是为康熙皇帝。十四日，王以下及大臣官员齐集大光明殿设誓，称若妄作非为，互相结党，即遭天诛^②。

与前两代君王皇太极、顺治当年继承皇(汗)位时的剑拔弩张相比，康熙的即位似乎显得颇为平静，而避开宗室诸王由异姓辅政可谓匠心独运，对减少康熙初年最高权力层的震荡，对玄烨顺利亲政以及强化皇权具有积极意义。

异姓四大臣辅政，是对满洲“旧制”的变革，自此，“以太后为中心，遗诏为根据，惩于前次摄政之太专，以异姓旧臣当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③的辅政体制正式确立。这一体制与宗室诸王摄政相比，对加强皇权极为有利：摄政诸王属宗室近支、皇帝长辈，本身又

^①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41页。本文引征该书凡未注明者均为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同上书，卷一，43—44页。

^③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410页。

是一旗之主，极易侵犯皇权，而辅政大臣虽功高位显，但为异姓臣子，除与皇帝有君臣名份外，还有旗主与旗员之间的严格隶属关系，四大臣公开承认太后和皇帝是他们的女主和幼主。他们作为皇帝的臣子及上三旗的属员，同皇帝的关系，在朝是君臣，在旗同父子，利害相关，休戚与共，这种君臣加主奴的关系，使辅政大臣对皇帝比诸王更加忠实，从而在体制上保障皇位不被篡夺^①。就君权行使而言，摄政乃代君出政，赏罚拟于朝廷，行使的是皇权，幼主不能参预大政，久之，摄政有篡夺皇位之危险。辅政大臣则不然，他们只是佐理政务，与幼帝共同听政，君臣名份昭然。用异姓大臣辅政，反映了皇权发展过程中欲排除宗室诸王掣肘的主体意识的加强，是对满族旧制的一大变革。在礼仪上，诸官奏事见辅政，初皆长跪，给事中杨雍建以逾礼上言，自后奏事皆不跪^②。这也可见辅政大臣终属臣子身份。

在康熙嗣位之际，为防范辅政大臣与诸王贝勒相互勾结以侵犯皇权，双方的“誓词”均有“不结党羽”这一款，而且辅政大臣还立

誓“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从而堵塞了他们之间相互交结的通道，权、贵分置也是康熙能够顺利消除鳌拜的原因之一。

鳌拜是康熙朝第一个以结党论罪的权臣。但鳌拜其罪显然有夸大的成分。值得注意者，康熙于八年(1669年)五月十二日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之谕中有这样一段话：康熙六年七月，朕曾启奏太皇太后祖母曰：钱粮、刑名事宜，所



康熙

^① 参见孟昭信等著：《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01页。

^②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杨以斋侍郎事略。

关重大，偶有大错，咎将不轻等语。遂令鳌拜、遏必隆等遇事暂且同办。而今看得：伊等权势甚大，结党作恶。下列“彼等劣迹”云云。从康熙帝钦定鳌拜十二条罪状谕^①，与《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九五月二十八日所公布之鳌拜三十大罪相比，后者不但罪款增加，而且罪名升级，有“逆恶种种，所犯重大”字样。再者，康熙于八年五月十二日拟定鳌拜罪状时，已将鳌拜党人拘禁，当时康熙帝携带钦定的“罪状谕”到太皇太后处请示对鳌拜的处理办法。故谕中有“著将彼等宗族尽行监禁，从重议罪具奏。至拘捕与否之处，再行具奏请旨”这样的话。此处“至拘捕与否之处”，显然是指鳌拜。太皇太后批准逮捕鳌拜。四日后（十六日）将鳌拜拘禁。鳌拜党被拘在十二日，鳌拜自然知晓此事，事实若如此，所记^②康熙以八旗少年擒鳌拜之说值得怀疑。这表明康熙亲政后即有如何措处辅臣之问题，对照《实录》更为明显，即仍令两人“佐理”。如果鳌拜确有“逆恶种种”，康熙帝也不会于五十二年（1713年）为其公开平反，追赠这位死去的辅政大臣一等男爵（雍正时追赠一等公，世袭罔替）。除鳌拜实际是康熙树立其皇帝权威的一个必然过程，他要将辅政大臣的权力收为己有。在中国历朝的政治斗争中，异姓功臣若不援附其他政治势力，往往成为皇权的牺牲品而少有作为。鳌拜党没有重要的宗室王公加盟，努尔哈赤第六子班布尔善以领侍卫内大臣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康熙六年），其系宗室，八年以鳌拜党革职锁禁，家产籍没^③，所以比较容易被清除。康熙帝亲政后要解决的三件大事没有除鳌拜这一项，他在晚年屡次忆及亲政后的种种“事功”，也没有提及亲政之初的这一次斗争。对除鳌拜大肆渲染以示康熙早年的英明大概是康熙朝以后的事。

在清除鳌拜党的过程中，四辅臣之首、索尼之子索额图立有首

^① 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2页。蒋良骐《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149—150页）与之接近。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

^③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3页。

功。作为勋戚力量的头面人物，他很快成为朝廷重臣，在康熙中后期的几次重大变局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索额图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清太祖时，他的祖父硕色、父索尼及叔祖希福等率领所属由哈达部前来归顺。硕色始终在文馆任职，其弟希福官至内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索尼在太祖时曾任一等侍卫，太宗时“日值内院”，皇太极去世时，索尼已是两黄旗重臣之一，在拥立福临为帝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①。多尔衮摄政期间，索尼和他的叔父希福一样因不肯依附多尔衮被罢官。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将索尼召还原职，并晋为一等伯，擢任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参预军国大政的决策。矢志效忠皇室的历史很容易把哈达赫舍里氏与皇室的关系拉得更为紧密。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索尼长子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被册立为皇后，另一辅臣遏必隆之女钮祜禄氏成为皇妃。让年仅十二岁的皇帝这样早地完婚，显然出于孝庄的政治意图，那就是笼络索尼家族更加效忠皇室，以分化四辅臣，削弱鳌拜的权势。同时按成家立业的传统解释，此举似乎在向辅臣证实玄烨已长大成人，有能力处理朝政。在喜庆的日子里，作为外戚的赫舍里氏家族普被皇恩，索额图也由三等侍卫晋升为一等侍卫，开始改变他个人及其家族的命运。

索额图的早年有着不幸的家庭境遇，他的生母乃“罪人之女”，名份微贱，后又因罪被处死^②，这些都在索额图的成长中留下了叠加的阴影。康熙六年索尼被授一等公，一等伯由其第五子心裕承袭。索尼去世后，其第六子法保承袭一等公^③。连续两次失去承袭父爵的机会，令排行第三的索额图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但幸运之神很快光顾了索额图，在其兄长、领侍卫内大臣，也即康熙

^① 《沈阳状启》，癸未八月二十六日。
^② 详见杨珍：《索额图研究》，载《清史论丛》1996年，辽宁古籍出版社。
^③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九，《赫舍里氏》。

帝之岳父噶布喇的支持、配合下,索额图以一等侍卫侍从康熙左右^①,并成为清除鳌拜的核心人物。

在铲除鳌拜的斗争中,索额图立有头功,他随即升任内国史院大学士,兼管佐领,并充任《世祖章皇帝实录》总裁官。次年改内三院为内阁,索额图改官保和殿大学士,此时担任内阁大学士的还有满人图海、对喀纳;汉军旗人巴泰,汉人李霨、杜立德、魏裔介、冯溥等人。

康熙十一年,索额图加授太子太傅,俨然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其权势也如日中天,声威气势震动朝野,连康熙帝的老师熊赐履也被他排挤出朝。

熊赐履是湖广孝昌(今湖北孝感)人,清初著名理学大师。康熙初辅臣鳌拜擅政,熊赐履侃侃言明政得失,并倡导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又奏“治理政务,有负众望,隐患未除,盟党愈固”,为鳌拜不容,当面向康熙帝称是弹劾他,请求惩治,赖康熙保全。除鳌拜后,举经筵,设起居注官,多赖其倡导。十四年,熊赐履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被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熊赐履以敢言称,康熙帝超擢其为大学士,显然有牵制索额图之意。这时平定三藩的战争最为艰难,康熙每天批阅奏章达五百份,内阁批本常出错误,但每次只议罚俸,康熙曰:他们心乱了,本无大事。当时冯溥、李霨、杜立德与熊赐履四位汉人同在内阁。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员,熊赐履错让三法司票拟。康熙查问此事。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熊赐履欲掩己误,次日五鼓先到内



索额图

^① 福格曰:侍卫品级既有等伦,而职司尤有区别。各级侍卫,“均统于领侍卫内大臣”。《听雨丛谈》卷一,25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凡清人笔记未注明者同此。

阁，令内阁中书将批本送上，中书退后，熊赐履确认自己错批，以为杜立德平日不甚精明，于是将自己的签子嚼毁，裁去杜立德别本一条批签，以小字书错批于其上；又取其不错之本入在自己数内。嚼签子事件很快被索额图所利用，他强拉杜立德一同启奏，事下吏部议处。当时明珠为尚书，问口供时各位大学士都在场，熊不出一语，索额图当众羞辱熊赐履，便说：“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仍不语，索又曰：“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降，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备至，熊遂落职而回^①。由于熊赐履初入阁，“望甚重，就是嚼签子事，天下都不信，还说是索公害他，没有这事”^②。虽然嚼签子事之有无今天难以考证，但索额图借题发挥、落井下石却是无疑的事实^③。

顾八代注考事件也颇能说明索额图之权势。顾乃满洲镶黄旗人，顺治年间从征立功，屡被提拔。康熙帝御试旗员，他成绩第一，被擢任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三藩之乱”时协助镇南将军莽依图规复广西，屡次击败吴三桂孙吴世琮所部叛军。康熙十七年莽依图病，顾八代率清军在盘江重创叛军，逼吴世琮自杀。随后又率领清军攻占南宁。次年考核京官，掌院学士拉萨里、叶方蔼因顾八代比较尽职尽责，以“政勤才长”注考^④。索额图以其不附己，改注“浮躁”。平定三藩是关系清朝生死存亡之大事，对前方将帅功罪之颠倒并非细事。改注后传旨下部察议。吏部言浮躁例应降调，顾八代存世职，令随旗行走。旋莽依图疏言：“顾八代襄办军务，竭诚奋勉，三载以来，运筹决胜，动合机宜。请留军前委署副都统，参赞军

^①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四，《本朝时事》。

^② 同上。

^③ 《满汉名臣传》卷十九，《索额图传》；《清史稿》卷二六九，《索额图传》均载此事。而且，康熙已有旨宽免，索额图却借题发挥，排之以去，见《清史稿》二六二，《熊赐履传》。

^④ 《满汉名臣传》卷十九，《顾八代传》。

务。”得旨，仍以原衔随征^①。顾八代不但是满洲勋旧、平叛有功之人，而且还是康熙诸皇子的老师。雍正帝回忆说：顾八代以学士协赞军务，劳绩茂著，备承恩眷，皇考且深知其品学优长，足为模范，特命为朕兄弟之师。朕自幼与其朝夕讲论忠孝大义，研究经书至理，肫诚周至，获益良多。嗣以公事挂误罢职，仍在内廷课读，数载抱疾闲居，戊子冬物故。朕亲临其丧，并遣人为之经理殡葬。本欲陈情于皇考之前，求加恩赐恤，值圣体违和，不敢渎奏。迄今回忆当年诵读情景，宛然如昨。^② 顾八代以皇子之师，从征有功而索额图竟能以己意改注，可见后者之跋扈。

另有记载索额图否定大学士之意见，任用本族之事。时大学士已将满人和顺安置为内阁中书，索额图欲用本家族之人，予以否定。和顺家人吴鸿锡书写情状，“伺索出，跪而上之。索大怒，掷书去，不顾”^③，骄恣蛮横，无以复加。

（二）权力平衡术与明珠入阁

康熙帝师熊赐履是在康熙有旨免罪的情况下罢官的，此事让康熙意识到索额图权势之盛如不及早加以限制，就有可能养成第二个鳌拜。明珠和勒德洪的入阁虽属循例而迁^④，但以其平衡、牵制索额图的目的十分明显。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十八日，康熙帝在弘德殿听讲官陈廷敬等进讲《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二章，康熙帝亲讲，并曰：“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君子小人势不并立。”陈廷敬对曰：“自古以来，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者，皆由于疏正人、亲小人之故。”康熙曰：“孟子所谓一暴

^① 《满汉名臣传》卷十九，《顾八代传》。

^② 同上。

^③ 《清稗类钞》第6册，2657页。

^④ 《听雨丛谈》卷一载：大学士初只五品，或以重臣兼领，或赐尚书、侍郎职衔以崇之。

康熙三年三月始改定大学士为尚书，左都御史晋阶，六曹侍郎推阶。

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透彻。人君诚不可不知。”^①君子小人是儒家关于治国用人的经常性话题，很难说康熙及讲官心目中的小人即是索额图，但把君子小人之进退与治乱相联系，恐怕又非无的放矢。批文略其时的身世一词，系承前知心事而有深意七月二十九日是明珠和勒德洪擢升武英殿大学士的日子^②。这一天，康熙帝在便殿召大学士索额图、李霨、冯溥，学士党古礼、孔国岱等入奏，事毕赐茶，向诸臣“询问经史大义”，并讲论前代朋党之弊。康熙帝曰：“人臣服官，一意奉公，惟当靖共匪懈，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密，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逭。百尔臣工，理宜痛戒！”^③康熙的这次训导，主要是针对索额图的。训戒索额图等结党与引明珠等入阁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绝非某种巧合，而是康熙运用权力平衡术的结果。

國人湖湘已生齒平氏跡（二）

勒德洪曾任刑、吏二部侍郎和户部尚书等职，在朝中供职多年，又属皇族，康熙将他擢升为大学士，主要是以其皇族身份震慑索额图。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勒德洪大失康熙所望，遇事依违于索额图与明珠之间，无所作为。

明珠是满洲正黄旗人，其曾祖仰家奴、祖金台什皆为强悍的叶赫贝勒。叶赫部在海西女真中力量



明珠

^①《康熙起居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308页。

^②《清圣祖实录》卷六八，873页；《清代职官年表》，大学士年表。

^③《康熙起居注》第一册，319页。